

宝瑞



——他的《一双绣花鞋》、
《梅花档案》，
曾使洛阳纸贵。
其《真言》会更使你惊然愕然。

真言

京城四大怪才丛书

张宝瑞◎口述
窦欣平◎采写

北岳文艺出版社





宝瑞



言

京城四大怪才丛书

张宝瑞◎口述
窦欣平◎采写



北岳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宝瑞真言/张宝瑞著. —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4.8

(京城四大怪人丛书)

ISBN 7-5378-2637-4

I. 宝... II. 张...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36018 号

宝瑞真言

张宝瑞 著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太原市并州南路 199 号)

www.bywy.com

山西新华印业有限公司新华印刷分公司印刷

*

开本:890×1240 1/32 印张:8.875 字数:190 千字

2004 年 8 月第 1 版 2004 年 8 月太原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

ISBN 7-5378-2637-4

I·2602 定价:20.00 元



宝瑞文章，自不待说。英雄少年，大气晚成。宝瑞一笑，状如弥勒，此乃不战而屈人之兵之道，难怪才子佳人，各路豪杰，奉为教主，惟常感叹其生不逢时，否则刘邦项羽何足道哉，西邪东毒更不在话下了。

——汪国真



宝瑞异人天相，属上帝的杰作，十四岁开始创作，好像有神助。“文革”手抄本小说《一只绣花鞋》《梅花党》《落花梦》等相继问世，使“文革”时的黑暗中国，居然还有不死的文学。他是那种灵根早慧，“没结婚就敢入洞房”的神童才子。

——吴欢



宝哥哥十年前即任新华社北京分社总编辑一职，他永远一副白胖胖娃娃脸，大眼睛水汪汪，充满童真。我至今很难理解十几岁的宝哥哥，为何写出《梅花党》《一只绣花鞋》等至今让人读来后背发凉的作品，更不知道他怎么忙里偷闲，写出这么多小说。他操控一个万把人的文化沙龙，还在新华出版社朝九晚五的上着班。

——司马南

.....

梁晓声



宝瑞这部书，是一部回忆录式的书。书中所忆人、事，皆与“写作”二字有关。他的本意，自然是要实事求是，实话实说的，故书名中有了“真言”二字。他的名字加在“真言”二字前边，使书名似乎有了几分佛气。倘我不认识他，只看书名，而且忽视了副标题，还会以为是一本佛家语录呢！

在这一部书中，宝瑞先生相当详细地回忆了自己在“文革”期间怎样一步步开始写作的过程。《梅花党》、《一只绣花鞋》、《落花梦》一类内容，在“文革”期间又哪里有可能印成书呢，遂成手抄本广泛流传。

我年长他二三岁。他在北京工厂里当工人，孜孜不倦地创作他那些“手抄本”小说时，我正在北大荒当知青。

当年我在北大荒是听说过那些“手抄本”的，自己却没亲眼见过一次。也不感兴趣。因为下乡之前，我毕竟读过些书了，耐寂寞的能力较大多数知青要稍强一点。很寂寞了，就自己写些什么。

“四人帮”粉碎不久,我终于见到了一部“手抄本”

小说，便是张扬先生的《第二次握手》。严格说那已经不能算是“手抄本”，而是印刷厂里印出来并已校过的样稿。它传到了北京电影制片厂，几经易手，我才读到，读后我觉得是一部不错的小说，认为“文革”已经结束了居然还不允许出版，实在没有任何道理。于是连夜写成一篇七八千字的评论《花草辩》，寄往《读书》，竟很快得以发表……

一个国家的青年们没有书读，这个国家的青年们是会总体患上痴呆症的。“文革”中红卫兵们的暴力行为，是痴呆症的前期表现。倘“文革”再拖几年结束，整代人就完蛋了。之所以并没那样，幸在“文革”结束时，青年们生理年龄上还是青年，有救。

我以为，宝瑞当年写那些“手抄本”，意味着是一个青年本能的精神需要，也意味着是对痴呆症的本能拒绝。而那些“手抄本”在当年广泛流传，证明当年的许多青年们，与宝瑞有同样的渴求，采取了一致的拒绝行动。

我得坦率讲，《梅花党》也罢，《一只绣花鞋》也罢，不论现在，还是当年，都不能引起我的丝毫阅读兴趣。即使在当年，同是“手抄本”，我愿一读的怎么也得是《第二次握手》那样的小说。

这里没有贬低的意思，而是要强调指出——当青年们在精神上饿极了，没有面包，玉米杆也能充饥。因为它有一定的糖分，能提供“卡”。在北方，孩子们是将玉米杆视为甘蔗的，偷拔几根，会嚼得津津有味儿。

《梅花党》、《一只绣花鞋》这一类当年的“手抄本”之所以广泛流传，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它们的故事性特别强，可谓悬念丛生，情节起伏跌宕。甚至可以下结论，它们的故事性，超过“文革”前十七年中的大多数长篇小说。因为那些长篇小说，基本上是现实主义创作风格的。但当年的“手抄本”不同，它们是非现实的，更是超现实的，编创的空间更大。

所以，当年写过“手抄本”的人，组织故事的能力，一定是特别强的。无疑，宝瑞便是这样的一个人。

宝瑞这一本书中，还有一部分内容属于文学对话录，比如与金庸先生的。这一部分内容，对我这样一个武侠小说门外客，是很有认识上的启发性的。那些对话阐述的也很有道理，都是我能接受的观点。

我想，宝瑞先生这一部书，对于后人研究“文革”时期“手抄本”现象，是很有史料价值的，而且我进一步认为“手抄本”作为“文革”时期的“地下”文化现象，与“样板戏”相映成趣，是挺值得研究和分析的，



并能从中归结出更符合我们今天的新的出版局面的一些有益的规律性的经验和教训……

2004年5月4日于京

目录^①

宝瑞真言 /1

我的故事从我的家谈起 /2

神秘的 10 号大院 /7



“文革”时期从中学生到炉前工 /16

梅花党里的绣花鞋 /22



手抄本是这样流传的 /27

《落花梦》是相对成功的手抄本 /33

表哥说，“文革”中你写的《命运》最精彩 /41

我成了“四五”天安门事件的“漏网之鱼” /43

三月一号是生命中特殊的日子 /48

爱意萌生的时候 /54



开始了记者之旅 /62

接触武术 /69

“醉鬼”张三的长孙是位隐士 /79

梁羽生称我的武侠小说名副其实 /84

与萧逸商榷“君子尚风流” /91

与金庸谈武侠 /98

“触电”的经历 /101

《一只绣花鞋》浮出水面 /104



一石激起千层浪 /106

《北京青年报》的第二次采访 /111

爱母亲胜于爱绣鞋 /124

目录^②

广播剧《一只绣花鞋》/126

听讲传抄者喜重逢/129

从《一只绣花鞋》到电视剧《梅花档案》/134

金蔷薇文化沙龙/136

你到底想要什么？/139

王长安，长安罢/145

月朦胧 鸟朦胧/149



天生不信邪/172

原来老蒲是手抄本的老祖宗/173

附张宝瑞作品：(短篇小说)——江湖水音/176



附张宝瑞作品：(电影文学剧本)——石破天惊/210

附：张宝瑞作品目录/275



宝瑞真言

——文革手抄本《梅花党》、《一只绣花鞋》作者人生自述

我写的这首自鉴诗是对我前半生的小结，其中也写了手抄本的境况，诗中贯穿了我的五部著作，即《一只绣花鞋》、《落花梦》、《醉鬼张三》、《孽海侠魂》、《云居寺》。

自 鉴

凄厉半生苦语迟，沧桑笑对榜揭时。
绣花鞋落无人觅，落梦花飞有谁知？
醉鬼原来佯自醉，痴侠依旧青衫痴。
书魂孽海飘无定，望断云居有泪湿。

自言自语：

每个人一生都有故事，有的多，有的少，有的喜多，有的悲多，有的多情，有的无情，有情的说天下有情，无情的说天下无情。有运的说天下有运，无运的说天下无运。孰是孰非，自有论断。我下面讲的是我的真实故事，有兴趣的就听一听吧——



我的故事从我的家谈起

我父母的恋爱经历是很曲折的。

我祖籍山东省荣城，母亲王桂英原籍山东蓬莱，爷爷是手工业者，父亲张洪义是穷苦的知识分子，父母都出生在辽宁大连，他们是大连财会学校的同学。母亲是大家闺秀，她的父亲是一位富商，家庭富有，后来家业败落。她的祖父曾经是大连商会会长。母亲生得美丽，她出入高档商店的时候，守门的人总是误把她当成日本丽人。母亲是一位典型的大连人，善良、正直、热情、大方。她对待仆人、伙计和侍女总是非常和蔼，有时候还教他们识字，很受人敬重。

当时的那个时代很讲究门当户对，所以最初的时候，外祖父决定把母亲嫁给一个开铁工厂的资本家。但母亲与父亲在学校时的感情非常好，他们自由恋爱，后来决定一起离开大连。他们先去了沈阳，在那里生活了一年多的时间之后，来到了北平，那时正好是1946年，两个人就在北平定居下来。



我的母亲（40年代初期）



1956年张宝瑞四岁

在北平定居以后，父亲先后在一些单位任职员，母亲开始并没有去工作，所以一家人就靠父亲微薄的收入维持生活。1949年北平解放前夕，父亲被抓壮丁，这可急坏了母亲，她四处奔波，好不容易才把父亲保出来。解放以后，母亲也开始工作，先是做居委会的主任，后来，又在一家小工厂做了厂长，最后又去北京商标印刷五厂从事供销工作。而解放后，父亲的工作状况也有所改善，在1950年的时候，进入了北京汽车制造厂担任会计师。

我们兄弟姐妹一共四个人，我排行老三，哥哥张宝林去内蒙古草原插队，姐姐张雪萍后来在地质部工作，妹妹张



燕萍在北京女十三中和国家人事部先后都工作过，后来跟随在英国剑桥大学做教授的中国丈夫在澳大利亚的堪培拉定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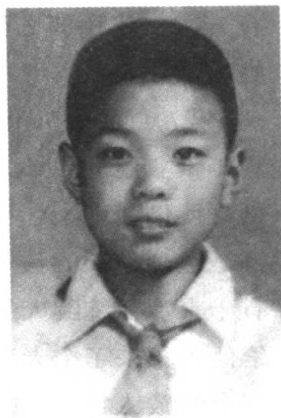
我1952年8月23日出生，童年和少年时期居住在东城区喜鹊胡同10号大院。

小的时候我就对文学特别感兴趣，以天下为己任，信奉的信条是“天下本天下人之天下，何为一人之天下；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这段话对我影响非常大，这也反映了一种共产主义思想。还有“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也是我人生的一个信条，就是一种不怕死的信念。这些信念在我的思想里根深蒂固的根本原因，我觉得，在于母亲对我的教育，很小的时候开始，我的母亲就给我讲很多道理，比如她教育我如何做人，她觉得为人要善良，要多帮助人，行善积德，“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一开始我还不都明白，但渐渐讲的多了，我的年龄也在不断增长，对她讲的东西也就能理解了。而且，母亲还给我买来了大批的古今中外文学名著的连环画，四岁的时候我就开始看，我每天看，有的翻了好几遍，最早买的一些连环画后来都看烂了。看这些连环画在当时更多的是因为觉得好玩，到后来才渐渐觉得，它培养了我的文学爱好。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很重要。而且，看连环画也发生了一些有意思的事情，比如，那时候，我和哥哥小小年纪就有了“经济意识”，为了看更多的连环画我

们在东单到王府井之间，有时候是在电影院的门口那儿摆上一个书摊，在那儿卖小人书或是交换小人书，卖书得来的钱再去买小人书，循环下去，现在想起来挺有意思的。

“文革”初期，我看过一些书，这些书多是表哥姜立忠借给我的。表哥是大姨的儿子，他比我大一岁，北京二十五中学生，也住在喜鹊胡同。从1966年一直到他当兵，他都是我形影不离的好朋友。我们经常在一起交流文学、思想。他当时拿了一本书，叫做《成功之路》给我看，书里有两句话我现在都能记清楚，是自己很喜欢的格言。一句是“不要为了摘取远处的红玫瑰，而踏碎脚底的白菊花”。这句话很深刻，我觉得那里面有两层意思，一是从处世哲学来讲，不要好高骛远、想入非非，不要盯着海市蜃楼，而应当从小事做起。二是从情感角度来讲，不要为了风度翩翩的女子而忽略自己的妻子。第二句话是“坚忍是成功的钥匙”，坚忍实际上是人的一种境界，想能达到坚忍

张宝瑞八岁时(1960年)



宝

瑞



6

真

白

的境界其实很难，这句话影响我，使我变得大度、容人。

表哥有一个同学，是阿英的后代，他家里藏书特别多，他经常借给表哥大量的书，我又从表哥那里借来看。我还有一个中学同学叫邢曙明，他的家里藏书也很多，我也时常向他借，所以我在“文革”初期就已经阅读了大量的古今中外的名著，像托尔斯泰的《复活》、司汤达的《红与黑》、屠格涅夫的《贵族之家》、雨果的《巴黎圣母院》等，那时候我才十四岁。我最喜欢的就是文史哲方面的书籍。

小时候我还组织了胡同的话剧社，喜鹊胡同的小伙伴们自己编剧本、相声、小品、三句半等，然后自己在胡同里演，我还记得，那时候表演比较出色的两个小伙伴，一个大名叫黎书香，小名叫丫头，敢闯敢说；另一个叫那忆贤，是满族少女。我们在大门洞里经常表演一些木偶剧，吸引很多人来看。有一次，我和那忆贤演《林海雪原》，我演少剑波，她演白茹。

我小时候是很倔犟的，一次，附近有个练摔跤的青年带着他的弟弟来找我哥哥寻衅。他上来就把我哥哥摔倒在地上，按住他，问他服不服？那时我哥哥是这个胡同的孩子头。我一见就急了，当时我只有十来岁，练跤人的弟弟和我岁数差不多，我上去给他弟弟来了个大背摔，把他摔倒在地，按住他，对那个练跤人说：“你放开我哥哥，要不然我要他的



命！”练跤人慌了，连忙放开了我哥哥。

神秘的10号大院

应该说，喜鹊胡同10号大院对我后来创作梅花党系列故事产生的影响非常大。

对我来说，喜鹊胡同10号大院是一个充满神奇的地方。我的童年和少年时期就是在10号大院里度过的，从某种意义上讲，那里正是我创作《一只绣花鞋》、《绿色尸体》等一系列梅花党故事的源泉所在。

我1952年出生在北京，1956年我们一家人移住到东城喜鹊胡同10号大院，1975年搬到朝阳区小庄居住。在10号大院共居住十九年。

10号大院是一个典型的北京四合院，一共是三进院落，住着十几户人家。据说，抗战之前这里是一对恩爱的年轻日本夫妇居住的地方，直到有一天，人们发现这对日本夫妇被人杀死在浴盆里。抗战胜利之后，这所凶宅才由普通中国百姓居住，而住的人也很杂，有知识分子，有工人，也有无业的人。我家住的是二进院的东厢房，原来是日本人家的厨房，一大一小两间屋子，很小。院子的厕所在三进院后面，每次上厕所都要穿过悠长的回廊，在很多家的窗户前经过，才能到那里。厕所的灯也不知被哪个坏小子打坏了，门也破了，一到晚上，漆黑一片。